

● 江苏省史学会编

抗日战争史事探索

雄鵬飛題



BC17\18

抗日战争史事探索

江苏省历史学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 567331

责任编辑 之 羲

封面设计 邹越非

抗日战争史事探索

江苏省历史学会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字数276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 —80515—182—2/K 23

定价: 3.60元

前 言

爆发于五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为保卫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广泛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在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由江苏省历史学会、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党史学会、新四军研究会、南京市历史学会、南京民国史研究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江苏省党史工委、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海军指挥学院、政治学院、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南京林业大学等十多个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个集子是从与会者提供的八十多篇论文中选取的一部分。

本集子所收之论文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之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观点和材料上都作了再探索，文章运用了一批尚未刊行过的历史档案资料，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所起的作用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在外交方面，也较为客观地评价了美国的对华的政策。凡此种种，都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新评价。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王家典、陈鹤锦、费正、史滇生、康杰、马洪武、储镜明、姜平、孙宅巍、施正东、陆仰渊等同志参与初选；由王家典、陆仰渊、孙宅巍三人参与定稿工作。

编者 1987年10月

目 录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中地区的战略方针·····陈鹤锦	1
新四军的组成和发展·····马洪武	12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及其组成·····张 衡	22
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姜志良	29
陈毅在苏北敌后战场·····汪正东	39
新桂系与西安事变·····申晓云	48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储镜明	60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苏南的合作与摩擦·····刘晓宁	70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史滇生	76
忻口战役与国共合作·····费 正	86
卢沟桥事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张廷栖	94
论国民政府抗战前期的战略得失·····王家典	100
南京保卫战双方兵力的研究·····孙宅巍	115
豫东会战述论·····陈谦平	129
武汉会战述评·····韩 风	141
一九四五年春江南先天道群众暴动·····蒋顺兴	153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工业的内迁·····吴晓晴 顾 宁	165

抗战期间工厂内迁对后方经济的影响·····	陆仰渊	176
战时贸易管制·····	冯 治	184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赋税政策·····	刘富书 刘 冰	193
日本对南通大生企业的掠夺·····	严学熙	206
国民党政府抗战时期土地政策试析·····	王赓唐 张 震	213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	邱 平 宋学文	217
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和反奴化教育斗争·····	沙兰芳	226
抗日救国斗争中的邹韬奋·····	姜 平 田 玄	235
评叶青的三民主义·····	杨振亚	243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蒋秀中	252
抗战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李庆余	259
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王 前	268
抗战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	顾莹惠	275
抗战初期中德关系的变化·····	吴首天	287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诱降的几个问题·····	刘守仁	294
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的伪政权·····	李安庆	308
日伪的“清乡”及其失败·····	吴雪晴	318
驳日军南京大屠杀“虚构”论·····	段月萍	328
抗战时期爱国党派、团体的作用·····	康 杰	337
抗日战争中的宗教界·····	马 烈	348
长沙大火·····	江君漠	359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中 地区的战略方针

陈 鹤 锦

1938年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战略方针。

华中地区位于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位处江、淮、河、汉、海之间，拥有沪、宁、杭、汉、徐等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工农商各业都很发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华中也就成为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三方必争之地。

一、发展华中，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要抗日必须要到华中敌后。

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抗日战争也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遭到中国全民族的坚决抵抗，进攻受挫，不得不改变策略，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经济上，则“以战养战”，加紧掠夺中国华中地区资源来补充自己。同时以此确保其占领区，巩固其后方，进一步扩大战争。鉴于此，要在政治上粉碎敌人的诱降阴谋，在军事上牵制其兵力，在经济上破坏其掠夺计划，在相持阶

段中消耗其进攻力量，便成为一切抗日力量当时的首要任务。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沦陷区阻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就必然地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方面来。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华北人民已在华北建立了若干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而华中敌后，国民党的抗日活动甚少，也没有足以威胁敌人的武装力量；新四军又方出动不久，还没有实行战略展开。显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要负起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使命，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首要任务。

第二，要生存，必须在华中立足。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活动的展开，国民党中的汪精卫集团公开进行投敌叛国的活动。蒋介石集团自1939年1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开始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他们污蔑共产党的抗日活动，进行反共宣传，还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和惨案。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又将反共行动推向高潮。国民党本想借日本人的手来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反而在抗日斗争中越战越强，他们便不得不亲自出来对共产党下手了。于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便处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中，形势险恶。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采取了两套办法。一是分割消灭。如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国民党企图从华中这个要害部位打入一个楔子，把南北联系隔断，使八路军、新四军彼此不能相顾，然后与日军默契配合，进行夹击，以达到消灭共产党之目的。二是借刀杀人。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新四军军长发出一份电报，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于一个月內

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企图把新四军、八路军全驱赶到日本侵略军的虎口中去，而国民党军则凭借黄河天险，堵死八路军、新四军的出路。无论那一种办法，总是要陷八路军、新四军于危境，置八路军、新四军于死地，以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确实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抉择。

为了克服国民党投降、分裂、倒退所带来的危险和粉碎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共产党除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外，必须要找到能够长期坚持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便在华中。如在华中建立起若干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象是在全国这块大棋盘上做成若干个“活眼”。日本侵略军吃不掉，国民党顽固派也吞不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能牢牢地生根立足，去夺取最后胜利。

第三，要发展，只有向华中挺进。

华中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除上面已提到的若干有利条件，在当时，还有着其它方面的若干有利因素。

1. 人、枪、款问题较易解决。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生死关头，华中人民为了保家自卫，拣起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枪支弹药，和侵略者作殊死斗争，各种各样的游击队风起云涌。虽然这些游击队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但大多数经过改造，可以变成坚强的抗日武装。当新四军深入敌后时，许多游击队主动要求属新四军领导。彭雪枫于1938年7月9日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说：向豫东挺进后，当地人民自发组织武装打游击，“人枪数百或数千不等”，“纷纷到来联络，要求派人前往指导，以图揭竿而起，待机而动，目前河南客观形势极端有利我们发展。”陈毅也谈到，“首都沦陷，国军主力以战略关系而转移，而留在后方之军民，纷纷而作游击起义。”^① 沦陷区人民盼望抗日军队去解放他们，

①《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7期，1939年7月25日。

“新四军则更受人民欢迎，每到一处，纷纷慰劳，捐款送物比比皆是，给养问题容易解决。”^①当江南抗日义勇军（新四军江南部队一部东进时的番号）到达无锡县梅村时，“极受群众欢迎与拥护，群众争先恐后地送慰劳品——猪、米、鞋、袜、酒，以及各种衣物和现钞”。^②

2. 华中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鄂豫皖是老苏区，大别山为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红军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新四军第四支队就是活动在鄂豫皖边区的红28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江苏各地也有着党的广泛影响，土地革命时期，苏南、苏北都有过多次党领导的农民暴动，苏中的如皋、泰兴、南通、海门地区还成立过红14军。抗日战争开始后，一大批失去组织关系的和从国民党监狱中获释出来的共产党人，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抗日活动。在回乡的革命者中，有的已经在农村中组织起很可观的抗日武装，有的在做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后积极寻找组织关系，渴望得到党的领导。新四军一到华中后，这些同志便很快集合到党的旗帜下，他们拉起的队伍很快便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所以新四军深入敌后的部队都发展得很快。到1939年底，苏南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由初入敌后时的4千人发展到1.4万人；彭雪枫部由3连人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部也由几百人发展到9千人。“如果开始就有正确方针，华中新四军可能顺利发展到数十万人”。^③向华中敌后挺进，是当时求得充分发展的唯一出路。特别是在华北的人力物力已发生困难的情况之下，发

①彭雪枫致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电，1938年7月9日。

②中共苏常特委关于江抗在苏常地区概况的报告，1939年11月。

③陈毅：《华中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

展华中更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唯一出路。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八路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38年年初到冬季，为行动准备阶段。这个时期，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中大片国土沦为敌后。此时，国民党在华中的政权土崩瓦解，而侵略者的伪化统治尚未系统建立起来，极有利于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4日指示长江局和东南分局：“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东进苏南，第四支队进军皖中，游击支队进入豫东，开始了新四军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新四军虽然还处于东进的准备阶段，但由于中共华中地区的一些组织“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上”，“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①，因而错过了可以大力发展的最好时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

1938年冬到1939年冬为全面展开阶段。这时，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国民党营垒由于亲日派首领汪精卫的公开降日而严重动摇和分裂。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更集中力量反共反人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9页。

民，国共之间的摩擦在各地逐渐发生。发展华中的问题在这时日见紧迫而重要。

为了更好地完成发展华中这个战略任务，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8年11月9日规定，所有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兼中原局书记。1939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规划了豫鄂地区的工作。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并与项英商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在新四军各部队中逐步得到贯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分兵一部进入苏州、常熟、太仓等地，又分兵一部进入江北地区，形成了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向北发展的有利态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盱眙县半塔集（今属来安）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底，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豫皖苏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豫南、鄂东、鄂中的抗日武装这时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南、鄂中游击根据地。

但在这个阶段，错误估计日本在占领武汉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而没有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津浦路和淮南路以东的广大敌后地区；加之刘少奇回延安开会，耽搁了一年时间。这使国民党有机会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限制与排斥共产党的抗日活动。

1939年冬至1940年冬是重点突破阶段，使发展华中的方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的形势特点是，敌人在华中华北困守堡垒，多次“扫荡”均归失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摩擦受到严重

失败后，将摩擦中心移到华中。发展华中的条件更困难，斗争更艰苦。1939年1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进入华中敌后，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果断的决策，初步确定了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统一战线策略和根据地建设问题。从此，华中敌后抗战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3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电复刘少奇、项英和北方局，肯定“淮北之皖苏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其具体部署是：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抽出一部过淮河、在皖东北整理后即配合彭雪枫部向苏北发展，中原局亦靠近彭部；皖南则酌抽部队及干部去增强淮南地区，以便四、五支队能抽部队过淮河；华北方面抽部队过陇海路南，并归中原局指挥；苏南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这是从西向东，从北向南，从南向北，重点突破，会师苏北的方案。实现这个方案，便可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华中敌后的主要地区便可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的管辖之下。

1940年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苏皖支队、挺进纵队，及皖东地方武装，经一个多月协同作战，先后击退国民党李品仙、韩德勤军队的进攻。七八月间，皖东抗日根据地向北发展至怀远、凤台一带和洪泽湖以东江苏的淮阴、宝应地区，并与南下的八路军共同开辟了这一地区。

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940年5月派黄克诚率第二纵队第344旅和新2旅共5个团，计1.2万余人及教导营干部500余人，南下华中。二纵到豫皖苏边区后，即奉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命令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8月，黄克诚率原新2旅两个团及第344旅第678团进入皖东北。接着，这支部队与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8、9

月间，第五纵队继续东进，协助地方党和地方抗日武装，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

这时江南指挥部在江南的部队，受到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兼第二游击区司令冷欣的步步紧逼，在江北的部队则遭到韩德勤等的围攻。陈毅为避免两面受损，当机立断，决定部署江南主力北渡，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7月3日，新四军江北部队击溃了顽固派的进攻。接着，率主力渡江北上的陈毅、粟裕挥戈东进，进驻黄桥，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由于八路军的南下和江南新四军的北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苏北已建立了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的前进阵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共同开辟的淮宝地区，则是由西向东进行战略策应的阵地。随着前进阵地的扩大，发展苏北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倾其主力15,000余人，分三路由海安，曲塘一线南犯黄桥。陈毅、粟裕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部，根据自卫原则予以痛击。10月6日，韩军第89军及独立旅全军覆没，韩德勤率残部千余人逃回兴化。新四军乘胜席卷海安、东台。10日，南下的八路军与北上的新四军胜利会师。

黄桥自卫战役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的会师，打开了苏北的抗战局面，使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终于得到实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0年10月17日指出：“此次陈毅、黄克诚两军大胜，苏北大部分为我占领并联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

三、发展华中方针的实现是党内认识统一到中央决策高度的结果

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以后，中共中央一方面给各地区、各部队下达指示，作出部署；一方面向各

级主要领导人了解情况，征询意见。各地党和军队的负责同志都积极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供中央研究参考。中央充分发扬民主，与各方面反复磋商，在广泛听取意见后，视时局的变化，不断充实完善原订的方案。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形成长期分散斗争的特点，抗日战争开始后，各战略区除战略上的配合外，基本上仍是各自为战，独立性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或者因为对全局形势缺乏了解，或者因为所处地区的局限，或者因为囿于以往的经验，对中央决策的某个部分、某个方面往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中共中央及时分析全国抗战形势，反复阐述发展华中的重大意义，并坚持六届六中全会的既定方针。在中共中央及其中原局的努力之下，在绝大多数地区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努力之下，党内认识终于较快地统一到中央决策的高度上来，从而保证了发展华中方针的实现。

在发展华中这一总方针下，新四军的主要行动方向在哪里，中央早就作过明确指示，也是后来许多电报中一再提及的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路、淮南路以东，大海以西这样一块广阔的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中央的分歧较大。

项英有一个大力经营南方的计划。早在1938年6月15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即提出：“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伍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新四军军部到皖南后，项英即计划在皖南建立根据地。这个打算原无可非议，问题是他只考虑向南，不积极向东向北。1939年12月23日又致电中央，要“独立开展南方局面”。1940年1月14日还说：“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①。陈毅在1943年所作的

①《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第43页。

《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项英“毫无根据提出天目山计划，浙江计划，黄山计划，又提出所谓具有中国伟大战略前途的坚持江南计划，企图与华北华中鼎足而三。”

项英的“三山”（天目山，仙霞山，黄山）计划，核心是要在南方造出一个大局面来，如果能够做到，当然应该争取，问题是“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①事实上，当时要“向南发展”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在皖浙赣地区一直驻有重兵，经常保持二三十个师的兵力。也就是说，那个方向还不是敌后，前去发展，师出无名。再说，皖南新四军的实力，与国民党军队相差太大。所以中央电报还说，“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同年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的电报中更明确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最不利的”。在皖南不但不能向南发展，而且新四军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险。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皖南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江北或者苏南，是非常正确的。

由于项英坚持他向南发展的计划，导致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与中央及刘少奇意见相左。如不同意皖南抽部队到江北，甚至要已过江北的部队及第四支队调回皖南，还要江南抽兵到皖南。这些意见没有为中央所采纳。项英的南进计划非但未能实现，反而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发生了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受到严重的损失。

中原局和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策略时，在豫皖苏的彭雪枫曾经认为：解决当前的物质困难和摩擦问题是以向东为有利；但要与敌伪及国民党作长期斗争，则以向西为有利，坚持平原战争，必须有山地为依托，否则仅可维持，不能巩固与

①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转东南局各同志电，1940年1月19日。